

文艺学语境中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丛书

汉语文体与文化认同研究

赵宪章
主编



中華書局

文艺学语境中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丛书

汉语文体与文化认同研究

赵宪章
主编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文体与文化认同研究/赵宪章主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1

(文艺学语境中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6238 - 0

I. 汉… II. 赵… III. 汉语—文体论—文集
IV. H15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1805 号

书 名 汉语文体与文化认同研究

主 编 赵宪章

丛 书 名 文艺学语境中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丛书

责任编辑 张 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½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238 - 0

定 价 45.00 元

目 录

第一编 历史体性

汉语文体的历史演变·····	包兆会	3
一、先秦时期的文体及对“体”的敏感·····		4
二、两汉时期的文体观及体的分类·····		6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体及文体观·····		10
四、唐宋时期的文体及文体观·····		15
五、明清小说的兴起·····		23
六、余论·····		25
汉语叙事的过滤机制·····	张卫东	31
一、叙事文本的“非典型性”·····		31
二、简洁、省略与过滤·····		34
三、记言、议论与叙事文本的意义建构·····		39
非文学文体的文学性·····	周欣展	45
一、“非文学”和“文学性”概念·····		45
二、非文学文学性的理论依据·····		51
三、格式：非文学文学性的内在属性·····		57
郡斋诗及其美学意蕴·····	李昌舒	79
一、郡斋诗的起源——谢朓·····		79
二、郡斋诗的思想基础——“身心相离”·····		81

三、郡斋诗的创立——韦应物	85
四、郡斋诗的发展——白居易	94

民间文体与民间言说	赵宪章	107
上篇 日记的私欲言说及变体		107
下篇 论民间书信及其对话艺术		127

第二编 当代新变

网络文学	包兆会	155
一、什么是网络文学		155
二、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挑战		156
三、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理论的挑战		159

超文本文学	包兆会	162
一、旧有文学范式的突破		163
二、超文本文学叙事		166
三、余论		170

超文性戏仿	赵宪章	174
一、复合文本及其超文性		175
二、“图—底”戏仿机制		179
三、语言狂欢及其卡通格式		186

无厘头文化	包兆会	193
一、作为后现代文化现象的无厘头文化		193
二、无厘头文化中“喜剧的笑”		195
三、无厘头：中国式的解构与后现代		200

图文体叙事	包兆会	203
一、图像的特性与魅力		203
二、中国文学图文组合		206

三、摄影文学及其图像叙事	208
四、余论	213
词典体小说	赵宪章 215
一、词典与小说:共时与历时	216
二、“可读之文”与“可写之文”	219
三、消解“虚构本体”,建构“零距离真实”	224
四、撩拨神秘往事,制造现代魔幻	229
五、语词战争:本体或工具	233

第三编 域外流播

美国华文文学的“他者”和“身份”	刘俊 241
一、“他者”的存在	242
二、“身份”的追寻	247
马华文学与中华文化	[马来西亚]许文荣 253
一、马华族裔与文化认同	253
二、政治中国的退位和撤离	255
三、文化中国的召唤	258
四、文化的困境与焦虑	265
五、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269
六、历史文本的重写/重读	273
七、唱不尽的一首老歌	275
京剧在新加坡	[新加坡]王芳 277
一、京剧在新加坡流变过程中的民族文化认同	277
二、京剧与文化认同	285
三、京剧的文化认同及其机遇	290
红色经典在印尼	[印尼]孙爱玲 298
一、红色经典的传播和接受	299

4 汉语文体与文化认同研究

二、两代印尼华人的文化认同	303
三、两代印尼华人的心态	306
四、演化中的“我们中国人”	308
附录:红色经典受众调查	311
编后记	赵宪章 317

第一编 历史体性

汉语文体的历史演变

确切地把握汉语文体十分困难,这不仅表现在“文体”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内容相当丰富^①,文体数以百计,纷繁复杂^②,也表现在中国古代的文体学源远流长,时间跨度很大^③,关于它的分类也很困难,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没有统一标准,有从语言和结构方面的,如四言、五言、七言、古诗、律诗、律赋等;也有从内容和题材方面的,如山水诗、咏怀诗、京都赋、江海赋等;也有从实用性和功能性方面的,如同属公牍文,就根据内容、使用的场合、用途的不同,可分为诏、令、章、表、议、封事等,哀悼文可分为哀文、诔文、祭文、谥文、墓志铭等。

本文的立足点不是要对中国古代文体进行详尽分类辨体,求全求细,也不是对中国古代一些文体包括文学文体和实用性文体的文体体制、渊源和流变及各种文体间相互影响作一详细历史描述和分类整理,而是侧重于关注中国古代文体如何在历史中演变,更多地从宏观层面考察中国

①有把文体理解为体制(文体外在的形状、面貌)、语体(文体的语言系统、风格)、体式(文体的表现方式)和体性(文体的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的。详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北京。有把文体理解为体裁、语言风格、章法结构、体要、体貌、文章之本体的。详见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载于《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北京。

②在魏晋南北朝萧统的《昭明文选》中选录文体三十九类,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选录文体三十四类,到了北宋李昉、徐铉等人编纂的总集《文苑英华》分体五十五类,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分体五十九类,而徐师曾《文体明辨》则分体一百二十七类。

③中国古代文体众多,这些文体大都起源于先秦,成熟于汉代,繁荣于六朝。唐、宋、明、清诸代又有新的文类产生,并出现在各个时代的文体著作和分类当中。详见贾奋然《从目录学、总集编撰到文体分类学》,载《文学前沿》第9期,2004年,学苑出版社,北京。

古代文体在历史发展当中,如何不断变化和扩大,如何对旧有文体进行突破和创新,并在传统体例当中获得自身的地位和合法性。具体地说,本文将以时代为框架,以文体创作实践(文体的具体应用、当时文体的整体观念、文体的具体演变)、文体理论(包括对文体辨析的辨体方面的理论著作及在目录学上这方面的认同和反映)为两轴,对汉语文体的历史演变作一简要梳理。

文学发展的历史也就是文体分化和流变的历史。文体分化产生了辨体的需要,辨体的系统化、理论化产生了文体论。由此看来,随着文学的发展而产生的文学分体现象是文体论产生的现实基础,而文体论则是文学分体现象的理论表现。中国古代文体论萌芽于先秦,发轫于魏晋,成熟于齐梁,此后便蔚成大观。

一、先秦时期的文体及对“体”的敏感

学界认为,先秦《尚书》的篇名多从“口”、从“言”,曰训(《伊训》)、曰诰(《汤诰》)、曰谟(《皋陶谟》)、曰誓(《泰誓》)、曰命(《原命》),均属声音传播的范畴。《汉书·艺文志》说:“书以广听,知之术也。”傅修延解释说:“《尚书》的功能为具载政治号令,由于古代的号令发之于‘口’,形诸于‘言’,故《尚书》篇名多从‘口’从‘言’,《尚书》的记言特征由此决定。”^①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亦云:“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尽管《尚书》的篇名很多,但古代的学者们大体可以揣摩出史官确有将复杂的官府策令辨体分类的意图,古人的文体分类意识似从这里萌芽,在这当中,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将《尚书》的文体分为十类,而古代(如刘知几)一般将《尚书》篇名中寓含的“典”、“谟”、“训”、“诰”、“誓”、“命”称为《书》之六体。《书》的六体是古代文体分类的渊源所在,特别是对后世行政文书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心雕龙·宗经》曰:“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明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中说:“夫文章之体,起于《诗》、《书》。……《书》体六,今存者三。”这“存者三”指的是“诰”(告谕)、“誓”(誓师大会)、“命”(命令)。这三

^①傅修延:《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种行政方面的文体在今天还在使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笔传的文体越来越多,“从‘言’诸体中增生了‘谏’、‘对’、‘让’、‘辞’、‘诉’、‘祷’、‘谏’、‘吊’、‘论’等新品种,下层的‘诵’、‘歌’、‘讴’、‘谣’、‘谚’也介入了时政,笔头传播则产生了‘书’、‘盟’、‘策’、‘牒’、‘简’、‘铭’、‘箴’等形态。”^①

宋代陈骙在《文则》中专门指出了《左传》所记载的八种文体:“春秋之时,王道虽微,文风未殄,森罗词翰,备括规摹。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一曰‘命’,婉而当,如周享王命重耳(僖二十八年),周灵王命齐侯环(襄十四年)是也。二曰‘誓’,谨而严,如晋赵简子誓伐郑(哀二年)是也。三曰‘盟’,约而信,如亳城北之盟(襄十一年)是也。四曰‘祷’,切而恻,如晋荀偃祷河(襄十八年),卫蒯聩战祷于铁(哀二年)是也。五曰‘谏’,和而直,如臧哀伯谏鲁桓公纳郕鼎(桓二年)是也。六曰‘让’,辩而正,如周詹桓伯晋率阴戎伐颖(昭九年)是也。七曰‘书’,达而法,如子产与范宣子书(襄二十四年),晋叔向诒子产书(昭六年)是也。八曰‘对’,美而敏,如郑子产对晋人问陈罪(襄二十五年)是也。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

按学者郭英德分析,早期文体名称的确定多为动词,是与人们在特定场合相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式有关,“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而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正是从对不同文体的行为方式及其社会功能的指认中衍生出来的。”^②殷商社会主要两件大事便是战争与祭祀,所以文体也侧重于与政治有关的应用文体。

古人在运用文体过程中,对文体的特点和功用自有其深刻的认识,如对铭的认识,“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

①傅修延:《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②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礼记·祭统》)这段文字清楚地说明了“铭”的文体主要是用来“称美而不称恶”的,是为了铭者“自成其铭”。

早期,除上述提到的应用性的文体之外,与文学有关的其他的文体也在产生之中,如诗歌体(《道德经》)、语录体(《论语》)、散文体(《庄子》)等,它们都与言说和口语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二、两汉时期的文体观及体的分类

两汉时期文体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与文学走向文本很有关系。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文本化的过程就是文学逐渐脱离音乐的过程,表现在文学实践中就是先秦可歌的诗发展为不可歌的汉赋的过程,所以这一文学脱离音乐的过程值得重视。

在尚未发明文字的时代,诗依靠乐而得到广泛传播,那时,诗就是歌,即声诗。产生于民间的声诗,不但合乐演唱,而且配合舞蹈,以集体歌唱为主。为了易唱易记,一般篇幅较短,以反复歌唱为常。在中国古代,声诗发展源远流长,从原始歌谣、《诗经》、《汉乐府》,直到词曲,而随着文字的发明,诗可以被记录,供识字者阅读,便逐渐发展出脱离音乐而独立部类的诗。如由歌诗变为诵诗、赋诗,由可歌可不歌的《楚辞》发展为完全不可歌的汉赋。“总之,在中国古代,诗与乐的关系有分有合,从诗到词曲,分的时候固然多,合的时候也不少。当一种诗体产生于民间时,最初与音乐都有密切关系,随后由于文人参与创作,使之得到发展和定型,其创作逐渐与音乐分离,产生纯诗。纯诗与声诗并行而不悖,此起彼伏,贯穿着整个中国诗史。”^①

我国诗歌本来就是和音乐密切结合的,《左传》提到吴国季札到鲁国观乐,结果所观的竟是“诗”,连篇名顺序和今传之毛诗大体相同,《孔子世家》云:“(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可见,我国诗歌是可歌的,而屈宋之作品,汉人称之为“赋”,汉代最重要的两种史书,提到屈原之作,都称为“赋”,如《史记·屈宋贾谊列传》提到屈宋之作,一概以“赋”称之,班固《汉书》亦然,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

^①赵义山、李修山主编:《中国分体文学史·诗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赋十四篇。”之所以称为赋，主要是因为它是“不歌而诵”的“古诗之流”。诗是合乐可歌的，不可歌而只能诵的，被称为赋。

《左传》常提到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之事，其实“赋”即诵也，赋诗言志即诵诗言志，这种情形和屈宋的诗不歌而诵是一致的，只不过，屈宋的“楚辞”必须用楚音来诵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楚辞类》引宋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屈原采取楚地之声调，将民间祭歌加工、修润成《九歌》，又由《九歌》演变成《离骚》、《天问》等宏篇巨幅。汉代的严忌、朱买臣等人，都因善于诵读楚辞而得幸，如《朱买臣传》：“言《楚词》，帝甚说之”，可见在西汉时，还有人能诵楚辞，《史记》卷八十四《屈原列传》云：“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在这里“辞”与“赋”是有区别的。“一般地说，‘辞’是指战国时期楚国之韵文，‘赋’是指汉统一后的一种非诗文之特殊文体。就体裁范围来说，‘赋’大于‘辞’，它可以包括‘辞’，所以屈原之作品也称作‘屈赋’。”^①不过，东汉以后，屈宋之作，似乎无人能用楚音来诵读。《隋书·经籍志》虽有《楚辞音》一书之记载，但并未见人据《楚辞音》来诵读《楚辞》。

总之，春秋以前的诗歌如《诗经》，多用整齐的四言体，此期的诗歌有音乐来伴奏，后来诗演变成楚辞，在用楚音阅读的楚辞基础上再演变成宽泛意义上一种非诗文之特殊文体赋，随着用楚音诵读屈宋诸作之法的消失，原本不仅可以用眼睛看也可用耳朵听的屈宋骚体在汉以后逐渐演变成只剩下用眼睛去阅读的文体赋文本，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创作实践中就是两汉骚体的蜕变，这蜕变表现在两汉以来仿楚辞的仿作中用来诵读的语气助辞，大量缩减甚至删除^②，以致于为新的文体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如骚体八言句中助词“兮”字的消失，它就变成了七言^③。

如果说，文学的文本化过程对文体意识的产生意义重大，那么汉代学术性的经学与偏重于文学性的文章的区分对文学自身走向独立起了重要

① 见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49页。

② 详见李立信：《两汉以来骚体之变革》，载《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与变革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32页，2006年，南京（未出版）。

③ 七言诗的起源必以纯七言为准，而纯七言系由骚体七言演变过来，而骚体七言是由删除兮之后的骚体八言演变过来。

作用。而两汉目录学的发展对两汉文体的总结、分类则起着整理、归纳和辨体的作用。

在先秦学术与文章还没有明确区分。《论语·先进》云：“文学子游、子夏。”，此处所谓“文学”，盖是一切书籍和学问。扬雄《法言·吾子》云：“子游、子夏得其书矣。”邢昺《论语疏》云：“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可见，孔门“文学”在后世分为文章与博学两科，但在孔子时代文学兼此二义。是则“文学”之义与今人所称的文学不同。孔门虽不曾分文章、博学为二科，而在“文学”总名之中，实亦分括文章、博学二义，当时用的是其他名称，以典籍性质言之，则是诗与书的分类，就文辞之体裁言之，则是诗与文的分类。《论语·学而》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何晏《集解》引马融说云：“文者古之遗文。”又《论语·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邢昺《疏》亦云：“文谓先王之遗文”。《史记·滑稽列传》亦引孔子“《书》以道事，《诗》以达意”之语，盖诗重在创造，所以达自己之志意；文重在述，故必考古昔之遗文。

到了汉代，先秦广义的文学细分为文章与文学（文与学），即经学与文学的区分已渐分明，汉代的文论家大体上都能区分文学之士与文章之士。文学之士主要指研究经学的儒生，文章之士包括擅长一般辞章的文人，也包括子书及史书的作者。今观《史记》所言“文学”各条，大都指学术言。而六朝的“文”、“笔”之分，即从汉时所谓“文”或“文章”一语再加以区分。梁元帝云：“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有四。”（《金楼子·立言篇》）惟其有“文学”、“文章”之分，有“学”与“文”之分，所以为二。

两者的细微区别在汉代目录学中也有所反映。西汉末年刘歆所编的《七略》把所有的典籍分为七大类：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在七大类中，已经出现了属于文学性质的类目：诗赋略，这表明诗赋类文学作品已经取得了与六艺、诸子并列的地位，在古代学术和文化体系中已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七略》已亡佚，但它的基本内容被保存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详细论述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区分诗赋与其他文体的原因：“观班《志》之叙艺文也，仅序诗、赋为五种，而未及杂文；诚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如论说之体，近人列为文体之一者也；然其体实出于儒家。书说之体，亦近人列为文体之一者也；然其体实出于纵横家。推之奏议之体，《汉志》附列于六经；敕令之

体,《汉志》附列于儒家。又如传、记、箴、铭,亦文章之一体,然据班《志》观之,则传体近于《春秋》,记体近于古礼,箴体附于儒家,铭体附于道家,是今人之所谓文者,皆探源于六经诸子者也。故古人不立文名,亦不立集名。若诗、赋诸体,则为古人有韵之文,源于古代之文言,故别于六艺九流之外。亦足证古人有韵之文,另为一体,不与他体相杂矣。”郭绍虞先生认为刘氏之论述恰当精要,“此言颇得刘、班著录之微旨。盖当时既有‘文学’、‘文章’之分,则别立诗赋一略,以著录关于文章之著作,本亦至当。”①

刘氏又说:“《汉书·艺文志》叙诗、赋为五种而赋则析为四类。屈原以下二十家为一类,陆贾以下二十一家为一类,荀卿以下二十五家为一类,客主赋以下十二家为一类。而班《志》于区分之意,不注一词。近代校讎家,亦鲜有讨论及此者。自吾观之,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类也;余则皆为分集。而分集之赋,复分三类:有写怀之赋,有骋辞之赋,有阐理之赋。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阐理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辞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观班《志》之分析诗赋,可知诗歌之体,与赋不同,而《离骚》则同于赋体。至《文选》析赋、骚为二,则与班《志》之义迥殊矣;故也正之。”

郭绍虞先生认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在文学批评史上至少有下列几种影响:“(1)文学与学术的区分。(2)文学本身的分类。(3)文集的编定。后世目录家有集部一类,盖即本此。”②

在文体流变史上,汉代是个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时代,汉代政治统一,朝章礼制完备,刺激了文章写作的繁荣,因而文体的分化也渐趋细密,在创作实践中产生了许多新文体。如司马迁在《史记》这部空前历史巨著中,进一步发展了历史散文的叙事艺术,在以情节为中心的连贯时序结构的基础上,又运用补充、穿插等手法,使文章布局严谨而不乏变化。这种纪传文体,为我国以后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赋又是汉代的代表文学,产生了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一批名家。乐府是西汉开始另立一名的,合乐的称为乐府,不

①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②同上注。

合乐的即为诗。汉代有五言诗产生并走向成熟,如《古诗十九首》,七言诗也开始萌芽。另外,许多文体的格式、规范都在汉代确立下来。“史赞”创作大为繁荣,其特点为“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文心雕龙·颂赞》),即褒贬人物要用颂的体制、论的言辞。《文心雕龙·杂文》指出宋玉的《对问》、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连珠》分别开创了三种文体。《对问》之后,班固、曹植等皆有设论对问之作,俨然自成一体。《七发》以下模仿之作称为“七体”,《连珠》以下亦有杜笃、贾逵等人模仿而形成了独特的“连珠体”。由于这类作品具有鲜明的特色而仿者众多,于是作品本身的特点就成为这类作品共同的规范,形成了新的文体。由于汉代有谶纬之学并且相信天人感应,所以作为文学与神秘文化的结合体谶谣、诗谶也在创作流播之中。汉代以策取士,文人不得不以“策问”方式进行考试,策文文体的流行自在情理之中。到《后汉书》所收录的文体总计已有六十多个类目,已与《文心雕龙》文体论总目相去不远。

汉代也有不少关于文体的论述,如刘歆《七略》,蔡邕的《铭论》,刘熙《释名》等。汉代王充《论衡》中有关篇章组织的较具体的论述,则可以说是开了文体篇章结构研究的先河。王充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论衡·正说》)这里提出了字、句、章、篇几个文章结构的单位,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还从意、数、体几个方面阐明了文章体制的组织系统,是我国文体理论研究上的一个突破。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体及文体观

这一时期的文体观对前人的突破主要是对形式的重视。在六朝晚期即已出现了声律、用典、对偶与词采高度成熟的五言诗与骈体文,并直接浸染唐宋文学的文体发展。

五言诗的最大特征是把《诗经》中四言诗的变化多端的章法、句法和韵法变成整齐一律,把《诗经》中四言诗的低回往复、一唱三叹的音节变成直率平坦。五言诗在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等朝代成为我国当时诗歌中最重要的诗体。汉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单音素为基础。在古代,单音词占多数,要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每个诗句至少要由两个词组成,后来,随着社会生活丰富和发展,双音词、联绵词逐渐增多,二言体就不能满足情感表达的需要,于是产生了四言体,如《诗经》就是用四言体